

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A World
Bank
Publication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杰拉尔德·迈耶
达德利·西尔斯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edited by Gerald M. Meier

and Dudley Seers

PUBLISHED FOR WORLD BAN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G·M·迈耶 D·西尔斯 编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5 印张 340000 字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198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统一书号：4312·308 定价：4.10 元

ISBN 7-5058-0132-5/F·109

翻译

谭崇台：前言、序、导言、第六章、跋

梁晓滨：第一、二、三、四、五章

马颖：第七、八、九、十章

校订

谭崇台

《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序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取得了民族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在经济上却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难和问题。例如:人民生活贫困、人口压力沉重、失业或就业不足、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低下、技术力量奇缺、产业结构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发展的资金短缺、城乡差别巨大,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严酷的不利地位等等。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解决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使经济发展起来,各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各种不同的道路,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颇不相同,其中有不少值得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各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经济的理论,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种种学派。由于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是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各种学派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主要是以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的,其中又以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的理论占主导地位。在西方国家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不同以及对问题的见解不同,他们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不相同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国家(例如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也面临着如何解决种种困难和问题,使经济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的任务。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不同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但也面临着一些与其他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共同或相似的问题。为了使我国的经济更顺利地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总结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需要研究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因此，近年来，在我国，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有些研究机构设立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室，许多大学开设了发展经济学的课程。

为了适应学习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需要，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成功之路，我们决定编辑出版《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丛书中有些是译自国外不同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正如前面所提出的，这些著作大多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有的著作虽然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是不同的，可能不合或不尽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对于这些著作我们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批判地来阅读，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在丛书中也将陆续编辑出版我国经济学家写作的发展经济学著作，论述我国经济的发展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希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能起积极的作用，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发展经济学能有一些帮助。

董辅初

1987年3月

译者序

(一)

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二三十年，逐渐形成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号称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前身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演变，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60、70年代后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曾有三种主要的看法：第一，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二，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三，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于十分强调这三个方面，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后来被称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理论”。

在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初期，一般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是很自然的。

首先，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说，生产投入要素有三：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所说的资本，指以机器、设备或可投资金之类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的丰欠，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但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经验已证明如此。劳动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充裕的投入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因此，物质资本的多寡及其形成的快慢，就是束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物质资本的匮乏，发展中国家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

环”，以致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为此，必须在投资努力上作出“大推进”，求得“平衡增长”。这一时期，两个著名的经济模式，为“唯资本理论”提供了论证的基础。其一是哈罗德—多马模式，这个模式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出发，认为，为了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以投资提高有效需求，但是，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将不足以保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因为，前一时期由于投资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比前一时期较多的产出，从而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再扩大投资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由于投资年复一年地扩大，产出将年复一年地增长，反过来，要产出年复一年地增长，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扩大。由此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二是两缺口模式，这个模式从凯恩斯宏观分析出发，论证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相等，但这一相等是事后的相等，事前，影响两个缺口的四个因素即投资、储蓄、进口和出口是独立地变动的，要主动加以调节使两缺口积极平衡，就必须从缺口之外开辟财源，即国内资本不足可以国外资本抵补。可见，两缺口模式也突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匮乏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其次，谋求工业化是新起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也体现了经济上摆脱依附、实现独立的民族感情。人们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地扩大外汇储备，以增加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进一步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所需的消费品和劳务。人们也把工业化看成是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途径。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的是有名的刘易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工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的源泉，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和伪装失业等等影响很大的概念。

再次，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计划化的重要根据，是发展中国家

市场的不完全性。持这种论点的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货物和生产要素的市场缺少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既不灵敏又不正确，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反映货物、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由此引起了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上社会评估与私人评估的歧异。因此，如果政府不干预，不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化，就会使现在的资源和未来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不符合长期的最大利益。不难看出，强调计划化，强调国家干预，也是强调资本积累和强调工业化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因为加速资本积累和调节工业布局 and 进程，不能寄希望于私营部门的自发活动，而要依赖国家和公营部门的干预和计划调节。在具体理论中，如大推进论、平衡增长论，甚至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也都包含着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的思想。同时，50年代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对经济规划的数理研究和经验分析，无疑对计划化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廷伯根认为，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可以用一种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来自实践的经验数据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计划的主体应当以一种理论结构或模式为基础。它应当含有数量指标和量化的政策工具，其基本形式为一套方程或把重要变量和理论框架连接起来的一系列技术的、行为的或制度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上述三个侧重点综合起来，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具有下述的一些特点：

1. 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结构上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等。这些特点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同于18、19世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非均衡现象，即某些市场中，求过于供，某些市场中，又供过于求。结构的特殊性也使经济增长的利益不易普及于广大的人群，从而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因此，

结构主义者认为，应当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不应当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而应当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进行结构改革，有计划地对资本积累和工业建设作出安排。

2. 反单一经济学传统的倾向。在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前，统治着西方经济学的讲台和论坛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自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无所不包的体系，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准则，因而主张只存在着单一的经济学。在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强烈地反对这种看法，例如，提出大推进论的罗森斯坦—罗丹就指出，不可分性、互补性、外在经济和经济规模等概念，比起对发达工业国家，更切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传统的、统一的理论已远远背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为此，当时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突破”传统的充分就业均衡模式而建立非充分就业均衡模式的作法，表示十分欣赏。第一，凯恩斯摆脱了传统的、统一的理论的束缚，为发展经济学家作出了榜样，第二，尽管凯恩斯学说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的，但是它特别关注就业问题，从而启发了发展经济学家对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象的深入探索。

3. 自认为经济发展理论是“宏大的”理论，这些理论连同以之为根据的政策建议，可以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例如，以“非共产党宣言”为副标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作者罗斯托，曾大言不惭地把他提出的理论说成是，体现了归纳现代史的方法，足以代替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所谓“起飞”，按照罗斯托的解释，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的一个突破，为了实现这个突破，需要每年把国民收入的10%以上用于储蓄和投资。罗斯托的理论曾喧嚣一时，被一些人视为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其他，如恶性循环论、大推进论、平

衡增长论等,一些人也对它们抱同样看法。

4. 内向发展战略倾向。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不支持比较成本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理由是,比较成本理论是静态理论,它关心的是来自贸易的直接利益,而不重视国内工业化所产生的间接的动态利益。工业化可以提高人民的技能并形成经济各个部分的联结,从而促成外在经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还从发展模式推论出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例如,刘易斯无限剩余劳动供给理论是以劳动市场扭曲概念为基础的,从而可以引申出一种论点:由于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数,现代化工业部门雇佣这些剩余劳动力时,所付出的工资必然高于其社会机会成本,因此,现代化工业部门应当受到保护。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著名的纳克斯提出一种看法:二战后的世界情况已完全不同于19世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再具有“增长发动机”的功能,而只有从立足于国内工农业平衡增长的进口替代政策中,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增长发动机”。由于此,有人说,50年代中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具有“出口悲观主义”的色彩。

5. 反新古典主义的基调。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只适用于静态资源的配置,而经济发展问题是动态问题,它涉及的是通过逐渐增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而得到的供给逐渐增长的可投资资源。新古典经济学是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以达到经济均衡,而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是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上增长和发展的道路的。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所假设的经济体系是具有韧性的,它可以按照价格的变化而作出灵活的反应,但这种假设完全不符合发展中国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多种的结构刚性:其一是社会学的刚性,即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小农对经济刺激具有无理性和无反应性。其二是技术的刚性,即在现代化工业部门中技术上缺少劳动与资本

互相替代的灵活性。

在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生了重大演变。

60年代初期、特别是6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出现了和第一阶段发展经济理论不相一致的情况。首先,按照那些理论而作出的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奉行国内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实施经济计划和政府多方干预的结果,是经济上遭遇着种种困难。进口替代经过较为宽松的初始阶段之后,便出现了国际支付差的赤字和国内通货膨胀,外汇的短缺和国内市场的狭小使进口替代由耐用消费品转向资本品的设想成为泡影。与此相反,那些经济比较开放、执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却在经济上取得比较快速的进步,一般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至少稳步地扩大了初级产品的出口,从而增长了外汇储备,其中,带头转向输出鼓励的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更在扩大劳动密集制造品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带来了经济的普遍繁荣。以东南亚地区而言,尽管要素禀赋和出口产品范围相似,经济较为外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在60年代中期,就比较经济较为内向的国家如缅甸和当时的印尼,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成就,其次,和出口悲观主义的预期相反,世界贸易额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增长,大大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各类出口产品(包括矿产品、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制造品)的需求。最后,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由五十年代的2%,上升到六十年代的3.4%。在六十年代,甚至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10—12%的储蓄率,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更高达17—18%。

在种种客观情况面前,发展经济学家不能不对50年代以来的理论和政策,重新评价,在许多方面作出重大修正和转变:

第一,对经济计划化的得与失重新评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曾相继地实行计划化。作为发展计划制订的方法,宏观经济模式、部门经济模式、以投入—产出矩阵为基础的跨部门模式以及线性规划模式风行一时,然而,经济计划化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计划工

作实际存在着许多畸重畸轻的缺点,例如,过于重视宏观模式和宏观计划而相对忽视从项目估价到刺激、群众参与等微观考虑;过于重视数量指标而相对忽视不可量化但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如人力资源的开发、社会文化的变化等都难以用适当的数据表示);过于重视计划的制定而相对忽视计划的执行,过于重视内向政策而相对忽视外向政策;过于重视城市的发展而相对忽视乡村的建设;过于简单模仿先进国家而相对忽视自己的创新和对外来事物的消化等等。

第二,重新对市场作用作出评估。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轻视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认为只要采取集中的、周密的计划管理就可以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合理的运转。6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看法是很片面的。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并提供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二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它可以用来完成政策目标并避免直接控制的低效率和腐化。三是它可以提供广泛的信息而花费不高。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误,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误”。但是,60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同时,又着重指出,他们并非主张政府必须接受自由放任的原则,而是主张政府应当利用、增进和加强市场——价格机制。政府不要完全依赖全面的、细节的管理控制,而可以通过价格变动来执行政策,可以为发展私人生产、增加输出和扩大国内市场提供价格刺激和收入刺激。价格变动包括外汇率、利息率、关税、租税和补贴。补贴和租税的配合特别有利于诱导厂商,使它们按照社会机会成本去估定投入的价值,开辟外在经济的效益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60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只批评轻视市场作用、过分计划化的一般政策,还进而批评了50年代中某些特殊政策、特别抨击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认为这种战略必将造成政府引致的种种价格扭曲:城市部门中利息率过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过高、农产品

价格过低和外汇率定值过高等等。各个发展中国家政策上的差异,引起了发展程度的差异:一个国家之所以穷,并不是由于贫困恶性循环,而是由于糟糕的政策;一个国家之所以不能利用外在经济机会,并不是由于外在条件不好,而是由于政策不当。

第三,对农业的偏见受到了纠正。在这方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证。他认为,在5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影响之下,农业成为“糟糕经济学的很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崇到损害农业的地步。其结果,农业被榨取了,伪装失业的概念被接受了,农民对刺激的反应力被忽视了。要发挥农业的作用,必须给农民提供经济机会,必须扩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认识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他说:“低收入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具有很大的能力去改变他们利用土地、劳动和经济机会的方法,……虽然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农民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现有的成就显示了他们学习的能力,例如,他们在采用粮食高产品种上取得的成功。鉴于适应低收入国家需要的农业研究的贡献和在这些国家中对农业发展投入追加资本的庞大数量,新型农民把这些研究贡献和追加资本转变为粮食增产的能力是明显的和巨大的。”^①

第四,国际贸易对发展的作用重新受到了强调。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G·哈伯勒。哈伯勒不赞同由凯恩斯倡导的把经济学分为“双经济学”(duoconomics)的作法。他认为,实际上,存在的只有“单一经济学”(monoconomics),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不过是增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一经济学就广义而言即是包括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照哈伯勒看来,发展经济学在初始阶段所具有的集中管理,反自由市场的偏见,是对大萧条的概念有误和自由主义衰退的结果,哈伯勒批评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种种说法如伪装失业、贸易条件恶化的长期

^① T·W·舒尔茨:《企业家能力的投资》,载《斯堪地那维亚经济学杂志》,1982年,第82卷,第437-438页。

趋势、有害的示范效应和贸易悲观主义，还批判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鼓吹“平衡增长”、“大推进”和经济规划而贬低市场——价格体系的作用。哈伯勒还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第五，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主要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 A·C·哈伯格。他根据实用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这三个假设是：竞争的需求价格衡量各个边际单位对需求者带来的利益；竞争的供给价格（即边际成本）衡量从生产要素供给者看来每个边际单位的机会成本；把所有的利益（正数）和成本（负数）总和起来就可以衡量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成本。哈伯格通过对扭曲和外在经济或不经济的校正，提出了解决如何量度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他认为，经济效益与其他目标和价值判断是同等重要的，考虑“基本需要的外在经济或不经济”是社会项目估价的优点之一。

综上，可以看出，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和第二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基本思路、问题论证和政策建议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之处，归结到一点，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注意发展中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西方的一统天下，提出了一些特殊理论，第二阶段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则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应用，无论在计划化的批评上、市场作用的重估上、农业重要性的强调上、国际贸易的再认识上，还是社会项目评估的研究上，都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这种情况的出现被人们称为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活”（the Neo-classical Resurgence）

当然，我们知道，在西方也有人从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观点论证经济发展问题，但并未形成主流，当前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主流派是新古典主义。因此，“新古典主义的复活”体现了西方发展

经济学演变的总的趋势。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这种演变，是否意味着新古典主义的一曲凯歌，意味着新古典主义成为普遍真理，意味着新古典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中重新取得胜利、恢复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呢？对这一问题，我持否定看法，理由如下。

首先，西方发展经济学 60 年代中期以后，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并不表明 50 年代中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纯属谬误、完全未起积极作用，相反，当时的理论和政策的确有其正确之处，在某些方面，的确对经济发展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争取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榨取和剥削，贫困成为普遍现象。在建国之初，百废俱兴，最感稀缺的必然是建设资金，最需要发展的是工业生产，从而扩大储蓄、加速资本形成，建立民族工业以谋求经济上早日取得独立，这不仅反映了民族愿望，而且也符合国民经济起步的某些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从结构上注意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和 18、19 世纪的西欧和北美不同，从而市场机制较难发挥作用，阻碍投入要素自由流动的并不只是市场的原因，为了谋求发展，也不能只限于如何促使投入要素自由流动，还应当有宏观计划管理。宏观的计划管理可以使企业和个人的短期利益不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相冲突，有效地减少失业，缩短收入差距，在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条件，决定了它们不能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往日走过的一段老路，对经济完全自由放任，而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管理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同时，市场机制无论运行得多么灵活，却往往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例如，普遍富裕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而市场机制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少数企业和个人领先的，只有在相当长期继续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利益才能渐渐地普及于广大的人群，收入分配的差距才能渐渐缩小。然而，普遍贫困的减轻是人民企望的目标，它的实现不能旷日持久，新兴的国家

不能袖手坐视，而应当在计划管理、政策干预等各个方面有所作为。对此，一些在 50 年代特别强调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也逐渐改变看法，转而认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应当同时并举。但是，第一阶段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总起来说，又确有其片面性，过分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其次，新古典主义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复活而且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正统，并不表明它已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的唯一体系。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依旧坚持说，应当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进行结构改革、社会改革，激进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穷国是海外势力的牺牲品，是国际体系中的“晚到的发展者”，障碍穷国发展的力量不来自内部，而来自国际体系的活动，国际体系的格局是“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市场力量将累积地强化国际不平等关系，在一方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一方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无障碍贸易”的结果，就是不发达国家走向贫困和停滞的开始。显然，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论点是和作为正统派的新古典主义的论点大相径庭的。

最后，新古典主义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卷土重来，加深了这门学科的庸俗色彩，强调渐进与和谐，是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观，这种观点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发展经验。作为单一经济学的主张者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往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来规范今日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发展过程具有统一的模式。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淡化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困难，如国际支付差的不平衡、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跨国公司的利害冲突等等。

西方发展经济学两阶段演变的脉络，大致如此抓住这条脉络，有助于对本书及其续篇的理解。